

鲁迅

小说新论

王润华 著

学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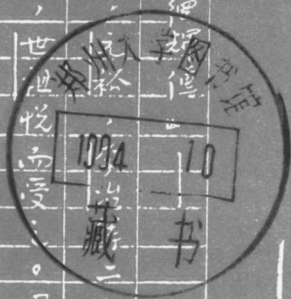
LUXUN XIAOSHUO XINLUN



01010436291R 郑州大学图书馆

鲁迅小说新论

王润华 著



然而，元遠山生平還有一宗大事，見于元史鄭德輝傳。

「世祖在潛邸，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瑤，瑤於世祖悅而受之。因啟：累朝

子，德輝與元祿北觀，清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累朝

有旨，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累朝

以拓跋魏的後人，清家古而共為。漢免的。儒教大宗師，在現在看來，

有旨，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累朝

清議操之于士，利益洗滌，雖已將。儒教。豈然，也不想再未同口了。

由以士大夫漸漸的進身，然終同不切實用，又漸漸的見棄。

南北之士的相角。日甚了。余國。青陽先生文集。春四。楊展照氏清集序云：

(沪)新登字 113 號

责任编辑：雷群明

封面设计：沈兆荣

鲁迅小说新论

王润华 著

学林出版社 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 140,000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510-844-7/I·295

定价 8.50 元

作者简介

王润华先生，原籍中国广东省从化县，1941年8月13日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金保市的小村庄地摩。在故乡接受中小学教育，在台湾接受大学教育，在美国攻读高等学位，后任教于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1980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1983年升任高级讲师，1991年1月1日升任副教授。从1965年出版翻译小说《异乡人》开始，至今已出版译著20多种，其中有新诗《患病的太阳》，散文《夜夜在墓影下》、《秋叶行》，学术专著《中西文学关系研究》、《从司空图到沈从文》等。

序

倪墨炎

新加坡王润华先生是学林出版社的老作者。早在1989年，学林出版社就出版过润华先生的学术论著《从司空图到沈从文》。这次润华先生又把他的新著《鲁迅小说新论：从狂死主题到游记结构》交给学林出版社。该社社长雷群明先生要我先看一看这部书稿，我当然乐得先睹为快。看后，按照惯例，我写了几条看法。群明认为这些看法整理一下，可以作为本书的小序，并说这是润华先生授权给他的。盛情难却，我也就遵命了。

润华先生的本书，是很有特点的，也是它的优点，我读后很受教益。

读完书稿，给我强烈的印象是：润华先生是从世界范围的背景下来研究鲁迅的。因而他视线开阔，思想活跃。他对于“神化鲁迅”的现象很不以为然。这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确是罕见的现象。在我国，神化鲁迅的现象是长期存在的，“文化大革命”中尤为突出，凡是反对过鲁迅、与鲁迅有过不同意见的人，或鲁迅批评过、在某些问题上看法不一致的人，几乎都被视为“反动”，几乎都被列为打倒之列。这种现象在今天看来，似乎大家都认为是荒唐的了，但在进步与反动之间“以鲁迅划线”的做法，在有些著作和文章中，也还有流露。对有的人和事，鲁迅并不了解实情，因而也不可能作

出判断,但有的人一定要把鲁迅说成“料事如神”;更有甚者,有人就写“回忆录”,说鲁迅“料事如神”的见解,就曾经和他说过。当然,这种“配合形势”或“根据需要”产生的回忆录,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推敲就漏洞百出。为了“神化鲁迅”,在研究鲁迅的领域里,也就有了“禁区”。润华先生在本书稿中指出的:过去很长时间,在不少《鲁迅年谱》和《鲁迅传》中不敢提及鲁迅前妻朱安女士,怕有洩鲁迅。这确是事实。据我所知,薛绥之先生主编的《鲁迅先生史料汇编》(第一辑)在1981年出版时,上面刊有一帧朱安女士的照片,竟有人上告领导部门,说是辱渎了鲁迅,掀起了一场说来好笑的轩然大波。“神化”也好,“禁区”也好,都是不合乎辩证法的。我们国家最讲究辩证法,年年讲,月月讲,不少事情上反倒是“形而上学猖獗”。润华先生周游列国,眼观四方,知识广博,思想上没有什么绳索的束缚。他研究鲁迅能真正从鲁迅史实和鲁迅作品出发,因而能得出合乎事实的结论。他的反对“神化”和“禁区”,也就显得有力。

在本书稿中,有好几篇论文是论及鲁迅的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这也和冲破“禁区”有关。在我国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时,一些研究者就努力从鲁迅作品中寻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现或因素。后来领袖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研究者们才比较“自由地”论述鲁迅作品中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及其怎样的“相结合”。对于鲁迅作品中客观存在的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对于沈雁冰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和鲁迅本人也承认的象征主义手法,大家却噤若寒蝉。因为象征主义似乎至少是“不革命”的,怕谈起了会使鲁迅不光彩。近十几年来,我国研究者终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对鲁迅作品中的象征主义手法开始了渐趋深入的研究。润华先生十分重视鲁迅的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他认为这不但表现在《野

草》中，而且也表现在《呐喊》、《彷徨》的一些作品中，并细致地分析了《药》、《故乡》、《白光》等小说中的象征主义手法。他还认为，鲁迅说过：“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这“生发开去”，不排斥“作家铸造象征的方法和过程”。因此，“鲁迅被称为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正因为他利用中国富有乡土和民族性题材来营造他的象征作品”。不仅如此，润华先生还从鲁迅有关论及象征主义的文字，《〈暗淡的烟霭里〉译后附记》、《〈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二）》、《〈苦闷的象征〉引言》、《〈十二个〉后记》等篇，特别是鲁迅多次自称在创作中最受安特列夫的影响，进一步论证了鲁迅对象征主义手法是肯定的，乃至是赞赏的。这更说明了鲁迅在创作中采用象征主义手法是自觉的。润华先生的这一系列论述，缜密，全面，给人以厚重之感。

润华先生论证鲁迅创作中的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并不否定鲁迅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的主流。本书稿中有好几篇论文探讨了鲁迅作品中怎样从人物原型到艺术形象的创作过程。鲁迅说过：“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鲁迅还说：他写小说，“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本书作者以丰富的材料，论证了孔乙己是由多种生活原型“拼凑起来的脚色”。众所公认的具有很大程度的自传性的小说《故乡》，其中的人物，本书作者认为也不是“专用一个人”的。像闰土，“是章福庆与章运水父子二人的混合作为模特儿”。事实上小说中的闰土的描绘，还不仅仅限于这父子俩的原型。然而，本书作者却认为《白光》中的陈士成，是“模特儿专用一人”，那就是鲁迅的叔祖周子京，虽然鲁迅在创作时进行了“改造”和“生发开去”。这些论述，说明

了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杂取种种人”也好,“专用一个人”也好,是来源于生活的原型而加以“改造”和“生发”,是合乎现实主义的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创作原则的。本书稿中,对于鲁迅小说人物的“狂”和“死”与反传统主题的论述,对于鲁迅小说探索病态社会与黑暗魂灵之旅的研究,都是从较为新鲜的视角,展示了鲁迅的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创作的深度和力度。

为了更深入理解鲁迅小说的创作方法的特点,本书作者还注意将鲁迅作品与外国作品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将《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疯人日记》、迦尔洵《红花》和尼采《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的细致的比较,对于《文学之旅》和众多西方游记结构的小说的介绍,以康拉德自传性小说《黑暗的心》与《故乡》的对照,都能使读者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活跃思想,提高鉴赏鲁迅作品的水平。

润华先生说:“在现代作家群中,鲁迅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同时也是影响我最深的作家。”读完这本论文集,我们感受到了他对鲁迅的深厚感情和深刻理解。

1992年10月于上海

目 录

序	倪墨炎
从鲁迅研究禁区到重新认识鲁迅	(1)
五四小说人物的“狂”和“死”与反传统主题	(18)
鲁迅与象征主义	(36)
探索病态社会与黑暗魂灵之旅：鲁迅小说中游记结构 研究	(46)
西洋文学对中国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的影响	(61)
探访绍兴与鲁镇的咸亨酒店及其酒客 ——析鲁迅《孔乙己》的现实性与象征性	(77)
论鲁迅《故乡》的自传性与对比结构	(102)
论鲁迅《白光》中多次县考、发狂和掘藏的悲剧结构	(127)
从口号到象征：鲁迅《长明灯》新论	(141)
附录：鲁迅研究重要参考书目题解	(164)

从鲁迅研究禁区到重新认识鲁迅

一、鲁迅故居只能容纳鲁迅孤独的革命形象

1989年5月下旬，我在天色阴沉，风雨迷濛的绍兴城住了几天。虽然那时已是初夏，天气依然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季节。

一个午后，我走进坐落在塔山南麓和畅堂的秋瑾故居。在黝暗的灯光下，我把一共三间五进的秋瑾故居慢慢看，细细地想。第二进东面的楼下，为秋瑾的卧室，室内木床、书桌、她用过的笔墨砚台，女扮男装的照片，还有壁内密室的枪械，都是当年原物。第三、四进原为秋瑾家人的住处，现已辟为秋瑾史迹陈列室，展出她的各种遗物和手迹。^①

秋瑾故居昏暗的光线，把作为一个女革命家，女中豪杰的形象大大突出了，但却把她作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遮掩住了。我的眼睛所见，我的耳朵所闻（有关故居的讲解），我完全看不见、听不到有关秋瑾的家庭与婚姻生活。她被塑造成一座没血没肉的铜像。

我从秋瑾故家门前的和畅堂路，撑着一把雨伞，挡住满城的风雨，慢慢步行到东昌坊口（现在改称鲁迅路二百号）的鲁迅故居黑油油的石库台门前，前后不过走了十几分钟。他们原来不但同乡，还是相隔不远的邻居。^②

在这所谓周家新台门里，鲁迅诞生、度过了幼年和少年生活。1909年从日本留学回国，第二年他回到绍兴，先后在绍兴府中学堂和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教书兼行政工作，一直到1912年北上期间，他都住在这故乡老屋。当1919年卖给别姓时，鲁迅还回老家告别，而且还把这经验写进小说《故乡》里去。

今天我们看见的新台门，是几经修建后，鲁迅本家所住的房屋而已，格局与原来的很不相同。原来十多户周氏家族聚族而居的堂皇的新台门，大部分地段与东邻六户人家的土地，再加上东边更远的周家老台门遗址，目前已改建成绍兴鲁迅纪念馆。^③

我二访鲁迅故居及其纪念馆后，心中不免纳闷，头脑中充满疑问。当初设计绍兴鲁迅纪念馆时，就应该完全恢复新台门的全部面貌，甚至老台门，^④然后就以原来的新旧台门建筑格式作绍兴鲁迅纪念馆。原来鲁迅小说中许许多多人物原型，包括周氏家族或非同族的外人，原来就住在新旧台门，甚至过桥台门里，走进他的故居，走过每个空间就等于在阅读鲁迅的一篇篇小说和散文，譬如在第四进的橘子屋，我们看见周子京神经错乱后，把房屋的地面挖开一个大洞，自然想起《白光》中陈士成考试失败，发狂掘宝的故事情节，可是目前修复的鲁迅绍兴故居，空间实在狭窄，不但容纳不了众多鲁迅小说与散文中的人物与事件，连鲁迅的兄弟，别的房族的人更不必说，居然也被排斥出去。^⑤我细心听讲解和观察，周作人、周建人似乎从未居住过新台门。当我在目前认定是鲁迅当年的卧室兼工作室时，我很想上楼探看一下，听说那是鲁迅当年与发妻朱安洞房的地方。他们说楼上不必看，没有什么。其实我知道他们要我们忘记一个悲剧，要推销鲁迅是一个“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⑥或者至少要塑造他是“无产阶级的伟人”。^⑦

从秋瑾和鲁迅在绍兴的故居的展览模式，我们可以具体地看

见在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在被肯定或否定时评价都是不够客观，否定的往往过于诬蔑，肯定的则一定以英雄姿态出现。我参观哈佛大学校园附近的美国朗费罗（Henry Longfellow）故居，所见屋内的陈设，完完整整，从他自己的到佣人的遗物，从书房到厨房用具，都全部保留，包括食物，这样我们可以从原来的生活环境中，来了解真正的朗费罗，他既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普通的公民。^⑧

二、鲁迅发妻朱安的住房是一禁地

鲁迅绍兴故居目前开放参观的那间书房兼寝室，是他从日本回绍兴教书时所使用。楼上的房间，鲁迅少年时代就跟长妈妈住过。1906年夏天，鲁迅奉母亲之命，从日本回故乡和朱安女士结婚，新房就设在楼上，当时鲁迅家的工人王鹤照亲眼所见，他后来回忆说：

我第一次看到鲁迅先生是1906年，这年夏天，鲁迅先生从日本回来与朱女士结婚的……鲁迅先生结婚是在楼上，过了一夜，第二夜鲁迅先生就睡到书房里去了。^⑨

鲁迅回家结婚时，周作人不在家，周建人亲眼目睹婚礼与鲁迅对婚姻的失望，他在《鲁迅故家的败落》有较详细的叙述：

婚礼照例是在新台门大厅里举行的，二哥说要回来，但还没回来，除了三个台门里的本家，很少有什么客人来，也不演戏，一点也不热闹。也许由于我大哥的意见，我母亲一切从简，只是在仪式上，还是照旧，由老台门熊三公公来祝寿，还是拜堂，我大哥装了假辫子，真是活受罪。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

我大哥的失望是很难形容的……^⑩

鲁迅的一位堂叔周冠五也在场，他在1962年回忆说：

结婚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楼的。……鲁迅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讲，我们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媳妇，他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⑪

绍兴新台门故居在1919年卖掉后，鲁迅亲自回乡把家人接去北京，他在日记中所说“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⑫，其中“眷属”当然包括鲁迅的妻子朱安，周建人的妻子及两个小孩。周作人在北京迎接，说他们一共七人。^⑬

鲁迅与朱安在北京一直住在同一屋檐下，虽然不共宿同眠。一直到鲁迅在1926年8月底南下厦门和以后在上海与许广平同居，才没有住在一起，不过鲁迅一生都负起赡养她的责任。朱安在1947年逝世时（那时鲁迅已逝世十一年了），还是住在北京鲁迅的最后的故居西三条胡同21号的房子里。^⑭这房子目前已修饰一新，并且成为北京鲁迅纪念馆。鲁迅的寝室兼工作室被称为“老虎尾巴”或“绿林书屋”，《野草》及《彷徨》和《朝花夕拾》中的一些作品，都在此创作。鲁迅的睡房在东边，朱安的卧室在西边，但是自从1956年，在好几处鲁迅住过的房屋中，选了西三条这所定作鲁迅北京故居，其东侧又建了鲁迅博物馆，但朱安住室，“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恢复原状，目前鲁迅的一部分书籍放在这里。”^⑮这种处理是有目的的。

绍兴与北京朱安的住室之被封闭，不公开让人参观，说明鲁迅研究长久以来尚有许多范围被划为禁区，或者至少不鼓励学者去探讨。这只是很多禁区中其中最微小的一个范围。学者们尽量不让人去接触鲁迅与朱安的婚姻，主要是怕破坏了鲁迅作为一个“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光辉形象。这些人大概作为“伟大的思想家

和伟大的革命家”，不应该向封建家族妥协，接受媒妁之言的婚姻。后来又加上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另外在上海定居，建立新的家庭，因此在许广平逝世（1968）前，更为了她而把朱安当作一种忌讳。许多有关鲁迅年谱、传记、回忆录的著作，从二十年代到最近出版的，都深怕踏到地雷或冒犯众怒似的，尽量避免打开这个秘密的“住房”，希望人们忘记或不知道鲁迅生命中曾有过这件事。

因此我随意翻阅一下我书架上的一些年谱和传记，如王士菁的《鲁迅传》（1948）、鲍昌、邱文治的《鲁迅年谱》（1979）、复旦大学等校《鲁迅年谱》编写组的《鲁迅年谱》（1979）都是一律采取点到为止的方法，把1906年从日本回绍兴结婚的事一笔带过，从此朱安便完全在鲁迅的生活中消失了。^⑧曾庆瑞的《鲁迅评传》在1981年才出版，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还是一笔带过，不敢打破禁忌的框框。^⑨

这种禁区的形成，并不全是因有严刑重罚在禁止，往往是一些教条的口号，例如复旦等校编写的那本《鲁迅年谱》在“例言”中就说明“本书力求按照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着重表现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把鲁迅当作革命家、全璧圣人和全人，甚至神的看法与写作态度，也深深影响了辑录鲁迅研究史料的人。从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到他家的工人王鹤照，他们都尽量闭口不谈朱安，虽然两人都与朱安曾住在同一屋檐下。^⑩周芾棠的《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由于叙述者皆非学术界人士，更加回避这问题。^⑪

可是最令人惊讶的是，其他有关鲁迅生活事迹的资料，也不敢把鲁迅与朱安的不平常的夫妻生活包括进去，譬如《回忆鲁迅资料辑录》（1980）及《鲁迅在绍兴》（1981），^⑫这两本资料都很有系统和详尽地辑录各种有关资料，像《鲁迅在绍兴》，连鲁迅小时拜了一个和尚为师的龙师父都有一组资料，偏偏明媒正娶的朱安的资料不

敢整理。可见大家都懂得江湖规矩。

鲁迅与朱安婚姻悲剧的禁区，幸好有另一批学者尽一切能力突破它，甚至把它解除。早期不顾忌讳的有林辰的《鲁迅事迹考》(1981)中的《鲁迅的婚姻生活》，坦直地叙述了当时资料所允许的有关他们“夫妻”的生活。^④最近几年，好些学者几乎自动地把它解禁，薛绥之等人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1983)第三辑中，就收录了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的文章详述朱安与鲁迅母子二人共住一屋的日常生活。^⑤其他资料中，在介绍北京八道湾、砖塔胡同与西三条三所故居时，都把朱安女士的住屋说明^⑥，这事看来微不足道，其实那是一大突破，从来学者或鲁迅亲友都不敢把她看作鲁迅家中的一分子。林非与刘再复的《鲁迅传》(1981)，也把第五章全部用来叙述鲁迅与朱安的前后关系。^⑦余一卒的《朱安女士》一文，长达20页，是目前我所读到最详尽的，态度公正的关于鲁迅与朱安婚后生活的文章。彭定安不但指出“鲁迅和朱安，这是一个以人们讳莫如深回避躲闪的问题”，并指出“承认、面对这个不幸的事实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探寻它的意义”。^⑧

把鲁迅神化之后，有人敢把鲁迅当作不是一个“完人”，不回避事实，鲁迅便恢复原来生长于新旧时代交替的一个中国人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个人才是真正的鲁迅！

三、鲁迅参加县考的秘密不准泄露

小说人物陈士成，经过十六次县考失败，好几次掘藏不成，心灵经不起刺激，精神开始失常，眼前出现幻觉。晚上回到屋子里，看见白光，摇摇晃晃像一把白扇，他以为这是埋葬元宝的记号，当他用锄头挖掘下去，结果泥土中有一块下巴骨。后来也追逐白光到城外，结果失足掉落万流湖淹死。

白光最早的来源应该是陈士成追逐终生的科举考试及格。清朝末年县考发榜时,为了便于计算,以每 50 人姓名写成一张圆图。旧读书人做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决定于自己的姓名会不会出现在圆图上。因此鲁迅特意安排陈士成发狂,是从这些黑圈变成白光圈的。

为了了解小说所说“十二张榜的圆图”,我发现鲁迅传记资料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禁区,它比鲁迅初婚事件及其与朱安以后的生活隐瞒得更加厉害。这是关于鲁迅曾经参加绍兴县考的事件。如果鲁迅没有受过旧传统的压力,曾被逼读私塾,又参加过县考,没有这种经验,恐怕就写不出像《孔乙己》、《白光》那样有深度的有关旧文人在科举考试下的悲剧。^⑤可是偏偏鲁迅如此珍贵难得的旧经验,许多学者却要千方百计地去把它隐藏起来。这不是阻止我们去认识鲁迅真正的生活与思想吗?

周作人最早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里透露鲁迅在南京读书时(1898),曾回到南京与弟弟周作人一道参加县考,鲁迅只参加一次初试,没有去覆试,名字居然也出现在“大案”上三图三十七(又作三十四),即考得第 137 名(因每一图由 50 人的姓名构成),后来他便回南京去了。亲友觉得可惜,便请一位亲戚当枪手去参加府试。结果考得八图三十(即第 380 名)。最后一关没有再派枪手去考(即院试),因此没有捞到秀才的名衔。^⑥

像鲁迅这种生活经验,大概怕影响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光辉形象,绝大多数有关鲁迅的年谱、传记、生平资料,都只字不提,或者以替他辩护的文字,一笔带过,譬如复旦等校编的《鲁迅年谱》说:“会稽县举行县考,鲁迅被本家叔辈拉去一同应试。他对科举原无好感……。”^⑦如果这是一项与革命有关的事件,《鲁迅在绍兴》之类的书,一定四处挖掘资料,把它发扬光大。

我个人的看法刚好相反,鲁迅在婚姻和考县试这方面的生活

经验，正是促使他创造出许多彷徨于新旧之间的小说人物的素材。如果把鲁迅与旧社会有生活关系的生活层面切去，那是难于了解他的文学作品的。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要探讨鲁迅小说散文的复杂性，千万不要去读目前许多有关鲁迅的传记！它只有阻止、妨碍我们去了解真正的鲁迅。

林森田 著

第四、鲁迅与国民党的关系会影响革命形象？

林森田 著

我在撰写《从口号到象征：鲁迅〈长明灯〉新论》一文时，注意一下《长明灯》最早发表的刊物与日期，居然发现它的复杂性与秘密性。^⑨虽然鲁迅成为现代作家中被研究得最彻底的一位，无论大小问题，倾全国之力去挖掘材料，因此单单有关鲁迅研究之资料的书籍，就多得难以计算。可是关于《长明灯》最初发表的刊物，官方出版的《鲁迅全集》注释资料，却一直说没法正确查明，还有待研究，这真是难以令人相信，让我举出一些事实加以说明。

1957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的《长明灯》注释说：“本篇最初可能发表于1925年3月的北京《民国日报》，因为一时未找到这一时期的该报，所以未能确定。”^⑩这条注释似有所隐瞒，是否实情如此，令人怀疑。到了1976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彷徨》单行本，索性不注明《长明灯》原来发表的刊物与日期，只指出写作时期是“1925年2月28日”。^⑪根据1979年复旦大学等校《鲁迅年谱》编写组的《鲁迅年谱》，《长明灯》甚至被推到可能未发表的骗局里，它说：“是否发表待查。”这本《鲁迅年谱》在“例言”中强调了学习和表现鲁迅的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而编写的。而《民国日报》是国民党在北京办的报纸，自然不愿鲁迅这个毛泽东制造的神话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国民党拉上关系。^⑫

在中国大陆，往往官方倾全国之力研究鲁迅，这些学者没理由